

关于“第二个结合”的三个基本问题^{〔*〕}

方兰欣

(郑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坚持并推进“第二个结合”,需要深刻回答为什么要结合、为什么能结合、怎样来结合的问题,也即相结合“何以必要”“何以可能”与“何以推进”三个基本问题。从必要性角度来讲,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由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性品格与“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的原则所决定的,是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是“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也是“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的现实要求。从可能性角度来讲,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各有千秋、内在契合、彼此需要,从而能够“和而不同”。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马克思主义赢得崭新形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传承和弘扬,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保持高度的理论清醒与文化自信,为两者的结合提供了现实条件。从实践着力点来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是博大精深而又自洽的体系,两者相结合涉及方方面面,要把握结合之实质、结合之主体、结合之点位,在“有机结合”“有力结合”和“有效结合”上下功夫。

〔关键词〕“第二个结合”;必要性;可能性;着力点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4.06.004

“第二个结合”是新近才明确提出的要求,但“第二个结合”作为一种“世界历史性的事实”早已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所明证。然而,感性直观把握到的事实并不等同于也不能代替理性的分析和认识,“第二个结合”合乎历史,也应当合乎逻辑,对此既要知其然,更要知其理、知其道、知其所以然。面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践在先、理论在后”这么一种实然状况,坚持和推进“第二个结合”,有必要立足新的历史方位对“第二个结合”何以必要、何以可能以及何以推进的基础性问题进行反思性追问。这对于“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意义重大。

一、意义性追问:“第二个结合”何以必要

明确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新时代新征程上深刻总结百年党史、着眼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而作出的一项重大政治论断和要求。这体现了新时代

作者简介:方兰欣,法学博士,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郑州大学意识形态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机制及运行优化研究”(23BKS058)的阶段性成果。

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清醒,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文化自觉与自信。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是“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也是“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的迫切要求。

(一)结合民族历史文化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适用原则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什么要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实际上是由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性品格与“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的原则所决定的。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具有普遍和根本的指导意义。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吸收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英法空想社会主义,以西欧历史和19世纪的资本主义为主体样本,回答“资本主义向何处去、人类向何处去”的时代课题,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按照列宁的说法,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赢得了世界历史的意义”,是因为它一方面扬弃了“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一方面“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1]马克思主义作为时代的产物,面对的是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重大影响,回答的是欧洲资本主义时代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领域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并依据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构思工人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战略和策略。客观来讲,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容具有欧洲历史特点,形式上也具有欧洲民族的叙事与表达风格,是科学内容和民族形式的统一。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和范畴的统一体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超越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发展过程中的具体判断、具体观点、具体结论及其现实依据的经验性与暂时性,上升到了对自然、人、社会和思维之本质与一般规律的普遍性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性质和整体特征,体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科学性、革命性的高度统一。相对于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所作的个别理论判断和具体结论而言,基本原理是对事物本质和发展规律的概括,具有普遍和根本的指导意义”。^[2]无产阶级政党、社会主义国家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从根本上来讲就是要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是坚持真理、追求真理、运用真理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运用要结合具体民族的历史与文化。马克思、恩格斯坚决反对形而上学和教条主义,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立之后,经常遭受到形而上学式的、教条主义化的曲解和误读,以至于他们在理论建构的同时也在不断澄清、前瞻这一理论的解释原则与应用方法。《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明确指出:“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3]在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看来,“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4]因此,不能把马克思主义视为关于具体问题的现成答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不能采取拿来主义的、教条化的方式,而应当同具体实际相结合。1887年1月,恩格斯在致美国社会主义者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的信中写道:“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越少从外面把这种理论硬灌输给美国人,而越多由他们通过自己亲身的经验(在德国人的帮助下)去检验它,它就越会深入他们的心坎。”^[5]也就是说,在马恩看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不能只是一种外在的“普照的光”强行“灌输”,而“必须考虑各国的制度、风俗与传统”,通过“亲身的经验”走进并深入一个民族的“心坎”,与特定民族的历史、文化、心理相适应。我们知道,对各个国家和民族来说,既定的制度、风俗与传统是一种“先在性”的存在,是一个民族的“根脉”。马克思主义如果不能与一个民族的“根脉”相适应、相结合,对一个民族来说马克思主义就

始终只能是一种“外在性”的存在,彼此处于“两张皮”的游离状态,马克思主义就难以落地生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强调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必须考虑制度、风俗和传统”,让马克思主义经由“亲身的经验”深入“心坎”等要求,实际上就已经表明他们在理论上已经前瞻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但要同各个国家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还要同各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相结合。一切把马克思主义“形而上学化”“教条主义化”“硬灌输”的理解和运用,都有违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理论品格,有违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理论旨趣。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各国应有所不同。”^[6]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符合经典作家对马克思主义应用于具体国家和民族的一个基本态度,符合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逻辑应然。

(二)重视“结合”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与经验的昭示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特定民族的历史文化相结合,符合基本原理运用的应然原则,也符合经典作家的论述与态度,从理论逻辑来讲是应然的、正确的。但具有理论逻辑上的应然性和正确性并不一定就是合乎历史的,并不一定就是现实的。因此,深入分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何以必要”,还需要“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这一结合的历史现实性与历史必然性。

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性相遇产生了“结合”的历史课题。曾经长期辉煌的中华民族在近代被拖入资本主义现代化所开启的“世界历史”体系之中,围绕救亡和启蒙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器物层面的变革失败了,制度层面的革新也失败了,如何突破封建主义的牢笼、避免资本主义的弊端和危机,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追求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先进分子,是中华历史和文化的产物,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如此说来,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文化是中国共产党思想上的两个“老祖宗”。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也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化中国”,这是理论指导实践的问题。而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的东西,中国有特殊情况,马克思主义要想“化中国”就必须实现“中国化”。中国有其独特的民族历史和文化,中国共产党又是坚定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者,这就意味着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化中国”还是“中国化”都存在着李大钊在《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讲稿中所指出的“共性与特性结合”的问题。因此,两个“老祖宗”历史性地相遇,两者之间如何“结合”的问题,就历史性地摆在了中国共产党面前。

百年大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启迪我们必须重视 and 处理好“结合”问题。大革命时期,党处于幼年,“由于没有经验,缺乏深刻的革命认识,还不善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7]中国革命遭受挫折和失败。土地革命时期,一部分同志“不去虚心领会过去的经验,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不了解,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统一的理解”,^[8]致使党和革命事业遭受“左”倾机会主义的危害。历经艰难曲折,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命题,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9]中国共产党“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结合起来”,^[10]制定了正确的革命路线、纲领,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全面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按照《共同纲领》的建国思路,创新发展了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成功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但是,社会主义建设

探索时期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国情是什么、如何从中国实际出发”等基本问题,党在认识和实践上接连出现偏差,致使社会主义道路探索遭受重大曲折,传统文化遭到破坏,教训极为深刻。改革开放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强调“要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于封建主义遗毒的表现,进行具体的准确的如实的分析”,“要划清文化遗产中民主性精华同封建性糟粕的界限”,反对“不加分析地把什么都说成是封建主义”,^[11]主张“认真钻研、吸收、融化和发展古今中外艺术技巧中一切好的东西,创造出具有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的完美的艺术形式”。^[12]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中国社会的文化视野不断拓展,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更加理性化。面对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态势下不同民族文化吸纳与排斥、融合与斗争、渗透与抵御的现实,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更加注重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我国几千年历史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我们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结合时代精神加以继承和发展,做到古为今用”。^[13]面对新世纪国家间文化软实力竞争的现实,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注重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运用、发展与创新,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和谐社会等。胡锦涛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中指出:“现时代中国强调的以人为本、与时俱进、社会和谐、和平发展,既有着中华文明的深厚根基,又体现了时代发展的进步精神。”^[14]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明确提出了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根本要求,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关系的认识 and 回答提升到了新的历史高度,拓宽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和途径的认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来说,“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15]这就把原来涵盖在“第一个结合”体系中的“第二个结合”独立出来、明确出来、凸显出来,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从一种自发状态进入了新的自觉高度。

总而言之,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实践中越来越深切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这种结合才能既克服教条主义,又解决中国问题,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

(三)坚持“结合”是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课题的现实需要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6]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中华文化时代化、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引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客观需要与必然要求。

一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不能丢,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不能丢。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指出:“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17]大的历史时代及其性质没有改变,那么,马克思主义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就依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辉。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里的学问,不是一劳永逸的现成答案,更不是僵化的教条。马克思主义不仅要坚持,还要不断实现中国化,向前发展。从科学的理论走向变革中国的具体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化中国”,从公共精神的西方形态到中国民族性的表达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经典作家创立

的马克思主义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化中国”“中国化”与“创新发展”都需要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首先,马克思主义“化中国”要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化中国”,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中国的实际问题不仅有理论上的,也有实践上的,要解决这些问题,就不能不触及历史问题。这就需“往回看”,要深入中华文化、文明的历史,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化”。其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用中国人喜闻乐见的民族语言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及话语体系的中国化。源于西方社会的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后,要适应中华文化,尊重中国人日用而不觉的思维习惯和价值理念,吸收和运用中华文化中的范畴、词汇、表述。马克思主义只有“中国化”,才能淡化其“外来户”的身份,真正在中国落地生根,才能真正起到“化中国”的作用。最后,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要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经典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对西方工人运动经验、近现代自然科学和西方历史文化的总结和概括,未能涵盖博大精深的中国历史文化。推进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既要总结提炼中国开创性的实践经验,也要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神、理念和智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文化传统、精神理念和思想智慧,体现了中华民族对自然、社会和思维运动一般规律的独特认识和把握,能够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添新内容。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能把马克思主义抽象化、简单化和孤立化,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根本途径。

二是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继续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现实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中华文化沃土,“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传承和升华,要认识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中国人,就要深入了解中国的文化血脉,准确把握滋养中国人的文化土壤。”^[18]全球化的发展,历史日益成为世界历史,暴力、资本隐退于幕后,文化和意识形态等软力量的较量首当其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世界文化激荡格局下中华民族站稳脚跟的根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是绵续中华文脉,捍卫中华民族独立性、主体性、整全性的现实要求。但是,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和赓续中华文脉不是“埋首故纸堆”的文化保守与复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不能单独应对近代中国遭遇的内外危机,也不能独自应对当下的中国问题,更不可能独自引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与时俱进、革故鼎新,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质和优势。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身所具备的这种特质和优势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逐步被日益封闭和僵化的传统政治、经济和社会体系所束缚。也就是说,传统文化本身是良莠混杂的体系,仅靠优秀传统文化单兵作战已难以在这一体系中突围,更别说“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使现实世界革命化”。要释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优势,必须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必须使中华传统文化实现现代化转型。无论是优秀传统文化的“两创”,还是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都需要马克思主义这个作为“他者”而存在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导向与塑形。

三是筑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根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需要。现代化是“历史”日益成为“世界历史”的进程,实现现代化关乎民族历史命运,也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主题和任务。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中国式现代化以新型现代化模式出场。中国式现代化植根中华文化沃土,科学理性对待自身民族历史和传统,贯通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融通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民族传统价值观念。如,中华文化主张“身心和谐”“心物和谐”与社会主义“物质富足、精神富有”的要求相结合,就有了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物质

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中华文化注重“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本质要求相结合，就有了中国式现代化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华文化追求“协和万邦”“讲信修睦”与社会主义“和平发展”的必然选择相结合，就有了中国式现代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19]中国式现代化不是人类以往现代化模式的翻版，而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伟大创造。这一“结合”的伟大创造“把‘自己’‘中国特色’提升到现代化这个同一‘频道’‘平台’‘层面’上进行阐述”，^[20]赋予现代性新的内涵，改变了中华民族的面貌，拓宽了人类通往现代化的路径。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1]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探索性的事业，中国式现代化的比较优势还没有从一种趋势性的可能完全转变为现实性的存在本身，还有许多未知领域，仍然需要进一步推进和拓展。离开中华文化母体，现代化的探寻势必会滑向西化，放弃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现代化的探寻势必会被资本主义所同化。避免改旗易帜的邪路和封闭僵化的老路，全面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自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四是引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现实需要。资本主义现代化及其全球化发展深刻改变了人的生产生活方式，使人的存在方式突破了“人的依赖关系”阶段进入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但是，资本增殖逻辑突出“物本”带来人的“异化”问题，同时资本增殖逻辑赋予资本主义扩张性、侵略性和排他性基因，给世界带来政治霸权、经济殖民、文化隔阂、社会撕裂和生态危机等全球性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当前世界困局在于不同国家、民族和文化单元中的人们已然处身于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地球村’中，但是仍缺乏一种‘命运与共’的共同体意识。”^[22]世界又一次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人类文明正处在新的十字路口，但是资本主义无法医治这种“现代病”，更无法开启人类文明新形态。因为，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其实质是将整个世界纳入资本主义文明体系，这种现代化道路试图驯化、铲除一切异己文明，但并不孕育新文明。世界各国如何相处，人类文明走向何处是当今世界最为根本的课题。面对“世界向何处去、人类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智慧，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创造性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方案，展现了对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美好愿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人类文明新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伟大创造。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在“文明的十字路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人类文明新形态需要进一步坚持和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二、前提性反思：“第二个结合”何以可能

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坚持和推进“第二个结合”意义重大，确有必要。但是，有必要不等于有可能，想做不一定能做。因此，我们需要结合新的时代方位，反思和追问“第二个结合”何以可能的问题。这种反思和追问有助于我们把“第二个结合”由原来的自发层面提升到一种更为自觉的层面。“第二个结合”何以可能，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彼此存在高度契合性”；二是，彼此需要，且相互成就；三是，思想解放为“结合”打开观念空间；四是，新时代为“第二个结合”提供了更为有利的现实条件。要言之，“第二个结合”不仅具有逻辑上的可能性，更具有历史演进中的必然性和现实上的条件性。

（一）两者各有千秋，但彼此高度契合

“第二个结合”之所以可能，从存在论意义上讲是因为“彼此存在高度契合性”。马克思主义和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契合却是一种客观性的“存在”。彼此契合的真实性存在,为两者的“结合”提供了预成性前提。

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各有千秋,但不能相互取代。完全相同的事物无所谓结合的问题,能够进行有机结合的双方,必定是存在一定差异的双方。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文化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时空差异。马克思主义(包括列宁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社会化大生产打破民族孤立隔绝状态,人类进入“世界历史”阶段形成的公共精神产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在中华传统文化之中,是农耕自然经济、封建皇权政治、宗法等级社会时代的产物。由于两者产生的时空环境不同、依托的社会形态不同,因而其特定内涵和指向也有差异。如,马克思主义所讲的实践观、人民立场、共产主义等与中华文化中的践履、以民为本、大同社会等具有显著的区别。第二,民族差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集中反映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理念、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生存智慧,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和本土性特征。马克思主义是世界历史的产物,带有普遍性意义,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属于欧洲民族,经典马克思主义创立的样本依据主要是欧洲民族及其历史文化,经典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欧洲风格、欧洲气派。民族性差异使马克思主义以来自中国之外的“西学”在中国出场。在中国大地上,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需要跳出欧洲民族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植根中华民族历史和文化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第三,地位差异。有学者认为,“两个相结合”之中的双方“不是以一方为主体、另一方为客体”,“应该是主体与主体的关系”,“双方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23]实际上,在“两个相结合”之中,双方确实不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但也不是“主体与主体”的关系。就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结合而言,双方不会自动结合,需要主体的桥梁中介作用。而这一主体应当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国式现代化事业的全体中国人。马克思主义是主体秉持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是“灵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主体的本源和材质,是“根脉”。两者之间应当是主体之“灵与肉”的关系,是“魂脉”和“根脉”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各有千秋,处于不同的地位、发挥不同的功能和作用,不能相互取代。

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在契合,可以“和而不同”。“风马牛不相及”,全无共性的双方无法进行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结合,从二者的实存状况来讲是因为“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即双方内在具有同一性、通约性和一致性。“中国文化中本有悠久的唯物论、无神论、辩证法的传统,有民主主义、人道主义思想的传统,有许多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因素、有大同的社会理想,如此等等,因而马克思主义很容易在中国的土壤里生根。”^[24]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契合性突出体现在四大方面:第一,基本精神具有相通性。马克思主义强调人之自为性、主体性、创造性,与中华文化注重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自强不息的“君子人格”和民族主体精神高度通约;第二,基本立场具有一致性。马克思主义坚持大众立场、人民立场,与中华文化注重民本、人本的立场高度一致;第三,基本观点具有共识性。马克思主义把实践作为首要的基本的观点,强调实践优先,与中华文化偏重“实用理性”,主张知行合一、躬身力行、经世济用的思维和理念有共识点;第四,社会理想追求有契合点。马克思主义追求全人类的解放,致力于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中华文化强调“修齐治平”、协和万邦,追求天下大同,二者可以说是“殊途而同归”。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中国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25]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文化,特别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内在契合性,两者可以“和而不同”,所以马克思主义能够进入中国并为中国人所接受。

(二)两者彼此需要,且能相互成就

预成不等于生成,仅有契合,不足以直接导出“结合”。“第二个结合”之所以可能,从生成论上讲是因为伴随历史演进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彼此产生了“结合”的需要和场域,而且其互相成就的“结合”结果反过来倒逼更深层次的“结合”。

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历史性相遇中生成了彼此结合的需要。有共性,所以可以结合,有差异,所以需要结合。但是,还需要双方具备结合的意愿和动力,这样才会彼此拥抱。双方结合的意愿和动力实际上是在双方历史性相遇中产生的。首先,马克思主义作为开放的体系具有注重结合实际、与时俱进的品格,而中华文化具有革故鼎新、开放包容、交流互鉴的胸怀,双方具有择善而从、从善如流的禀赋和特质;其次,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文化彼此互补。近代中国历史表明,单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无法解决中华民族的近代性危机。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若不能与传统文化相结合,就难以真正走入人心、落地生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需要马克思主义提供科学世界观支持和方法论指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文化载体和精神营养。总的来讲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需要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介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化”需要马克思主义来激活。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彼此需要取长补短,应当在交流互鉴中实现“和而不同”,进而才能实现互促共进。

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确实在交流互鉴中实现了相互成就,这种相互成就的结合形态和结果推动两者更进一步的“结合”。哲学层面来讲,矛盾双方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是矛盾关系的一种和谐状态。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26]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两个来源不同的思想体系,两者交流互鉴的百年进程中,文化惊诧和思想碰撞在所难免,但两者在辩证运动中也实现了“结合”。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作为一种“辩证运动”,其结果是相互成就,“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两者相互成就的“结合”形态和结果主要表现为:让“外来者”身份的马克思主义经由结合成为中国的,在中国落地、生根并蔚为大观;让“旧时代”产生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由结合成为现代的,摆脱持续下沉命运,被激活并实现换羽新生;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巩固了文化主体性。当然,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百年来的这种“相互成就”的结合形态和结果,特别是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不仅为推进“第二个结合”提供了历史合理性支撑,也为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第二个结合”提供了前提性基础、条件和要求。涵养“结合”所造就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发展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扩大因“结合”所打开了的创新空间,巩固因“结合”所巩固了的文化主体性,都要求和倒逼更高层次的汇通和融合,反过来要求和倒逼“第二个结合”。

(三)思想解放为“第二个结合”提供了观念前提

“第二个结合”之所以可能,从观念论上来讲是因为新的思想解放为“结合”进一步扫除了思想障碍,打开了文化空间。“第二个结合”是思想解放的结果,同时其本身作为“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的过程和要求反过来为“第二个结合”提供了思想解放的观念前提。

思想解放为“第二个结合”廓清了观念认识问题。所谓思想解放,是把“隐藏”在思想中的“前见”“成见”揭示出来,并以新的观念前提构成新的思想。重建思想形成的观念性前提,推动思想的自我更新和发展,才是真正的解放思想。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历史性相遇之后,两者之间的汇通和融合是在一定的观念场域中展开的,需要突破既有观念认识限制。近代以降,国人时常为“古今

中西”之争所纠缠,在对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的关系上存在一定的偏见和成见。囿于“传统—现代”的对立思维程式,一些人将传统文化贴上了负面性的标签,极端者甚至视传统文化为“毒奶”,主张“断奶”“换奶”。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人们看到的不是“优秀传统文化”,而是缺少了“优秀”二字点缀的“传统文化”。从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反四旧”,把传统文化一概视为“封资修”进行简单否定、批判、打倒。基于这种二元对立性思维,改革开放进程中一些人把外来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奉为主臬,热衷于译介和套用西方概念、话语、范式,对本土性资源重视不够。耕了西方地,荒了中国田,把中国当成了西方理论的“试验田”。今天,随着中国社会日益能够“平视”世界,“第二个结合”作为思想解放的结果,其本身就是对古与今、中与西“冰炭不同炉”这种二元对立思想的证伪。相对于中华传统文化而言,马克思主义是“外来户”。但是,经由“两个结合”形成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既具备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也得到了中国实践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它不仅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而且已经同中国人自己的生活经验融为一体,已经渗入到中国人的心坎里。马克思主义本身已经进入到中华文化之中,成为中国人文化基因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第二个结合”,就是要解放思想禁锢,让人们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种种误解中解放出来,从对西方的迷信中剥离出来。

思想解放为“第二个结合”打开了更广阔的文化空间。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是在一定外在环境和主体之间中展开的,必然受文化环境和主体自身认识水平所限。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27]这就是说,思想解放虽然属于观念、精神领域,但其作用并不限于观念、精神领域,对经济发展、政治制度、国家治理有着巨大反作用。如果仅仅是为了解放思想而思想解放,那就是纯粹搞思想内循环、精神内耗。思想解放一定是有使命意识、问题意识的,是要通过解放思想打开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局面的。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过两次重大思想解放,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标志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正式提出,其针对的是当时普遍存在的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共产国际决议神圣化倾向,解放的结果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开辟和毛泽东思想的形成。第二次思想解放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第二个结合”作为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其聚焦的使命任务就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新时代最大的政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反两面相互交织,死的抓住活的,旧的拖住新的,不能作非此即彼的简单判断与取舍,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需要正确的方法论指导。“第二个结合”让我们能够以更加科学理性的态度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把其中具有“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根基和文化底蕴,以中国式现代化激活并延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四)“第二个结合”在新时代更具现实条件

黑格尔曾经讲过,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时才起飞。“第二个结合”为什么是在新时代才明确提出来?这就不能仅仅停留在前面认识论、观念论层面的分析,还需要深入研究并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究竟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供了什么样的现实条件。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擎科学社会主义旗帜,马克思主义赢得崭新形象。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之本质与社会历史发展之谜,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奥秘及其必然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命运,指明了无产阶级解放自身进而解放全人类的路径,使社会主义从空想转变为科学。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

科学理论,人类的理性逻辑能够为其明证,但归根结底有赖于现实实践的检验,“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28]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现实,由一国走向多国,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但是,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社会主义陷入低潮,马克思主义遭受多方质疑,一些国家和政党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国际大气候影响国内小气候,国内一些人对坚持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和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有不同看法。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顶住国内外压力,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不动摇,成功开创并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就使处于低潮期的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与活力,使中国成为当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地带,在资本主义占据主导地位的世界体系中高高举起了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这就不仅从现实上彻底改变了‘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世界格局,而且从理念上真实地打破了‘西方模式’引领人类文明的神话。”^[2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上的巨大成就,反过来检验并证明了作为根本制度的社会主义“好”,作为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能”,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所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充分检验,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在中国得到充分贯彻,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时代性在中国得到充分彰显。”^[30]马克思主义赢得了崭新的形象,在新时代中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更加有利的舆论氛围、更加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更加坚实的社会现实条件。

其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传承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自我”意识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发展史中,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孕育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近代以来,由于西方列强入侵,再加上政治上层建筑腐败和社会经济基础衰败,中华传统文化受到冲击、质疑和否定,中华文明蒙尘,面临赓续危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为中国共产党所掌握,中国人在精神上开始由被动转为主动。“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历史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注意汲取其中积极的养分。”^[31]中国共产党是坚定的历史唯物主义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科学理性对待民族传统文化、文化传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积极吸收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有益养分,着力克服传统文化中的局限性,坚决摒弃和改造传统文化中的糟粕部分,使现代化建设植根中华文化沃土的同时绵延了中华文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为中华文化繁荣兴盛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保障,实现了民族文化由被动到主动、自卑到自信、衰弱到繁荣的历史性转折。进入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推动中华文化时代化中激活了中华文化,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我”意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文化自我”意识的增强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供了更加积极的文化环境和文化心理基础。

再者,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保持高度的理论清醒、历史自觉和文化自信。中国共产党是立足中国大地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实践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与弘扬者。“一百年来,党坚持性质宗旨,坚持理想信念,坚守初心使命,勇于自我革命……保持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不断提高”^[32]特别是进入新时代的十多年来,党的肌体在全面从严治党的中得到净化,党的理论和实践创新双重发展,党经受革命性锻造在认识上更加清醒、政治上更加成熟,具有更为强烈的历史自觉与历史主动精神,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更具能力和信心。与此同时,植根中华文化沃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

国式现代化在世界范围内展现出强大生机与活力,彰显了中华文化的时代价值和意义。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更是一种突出优势。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文化的认识更加理性和自觉,对坚持中华文化立场和绵延中华文脉更加自信。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清醒、历史自觉和文化自信,为新征程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供了强有力的主体条件。“第二个结合”是在新的历史方位下明确出来的,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是党的创新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具有历史必然性。

三、实践处着力:“第二个结合”何以推进

“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关于“第二个结合”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怎样实现结合”,也即“第二个结合”何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是博大精深而又独立自洽的体系,两者相结合涉及方方面面,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是一篇大文章,同时也是一个循序渐进,需要用心用力、久久为功的长期过程。坚持和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要把握结合之实质、结合之主体、结合之点位,在“有机结合”“有力结合”和“有效结合”上下功夫。

(一)把握结合实质,实现有机结合

实现有机结合,需要回答“结合什么”“结合成什么”等问题。

马克思主义不是特定学科体系的组合,而是揭示“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与“人类解放的学说”,不仅逻辑自洽,而且是“一整块钢铁”,具有鲜明的整体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也是自成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分属两种不同的体系,两者历史性地相遇后“用中国传统文化来取代马克思主义”或者“用马克思主义来拒斥中国传统文化”这“两种错误的倾向总是像梦魇一样压迫着人们的头脑”。^[33]“近年来在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在对待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上”,“以儒代马论”和“以马废儒论”两种错误论调依然存在。^[34]在历史发展的特定阶段,适应特殊形势要求,马克思主义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偏重一端有其历史合理性。但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华文化时代化发展的今天,强调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既不是一方“吃掉”另一方,也不是将两者外在地、局部地、单向性地、机械式地捆绑在一起,而是内在性的、体系化的、双向互助式的有机结合,形成“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35]因此,这种结合的实质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本质不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赓续绵延前提下的“双方优势结合”和“双方功能互补”,其结果是相互成就。

坚持并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有机结合,关键问题是要厘清“结合什么”。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此有过说明:“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36]那么,要把握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实现其贯通、融通,需要“培养既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能够熟练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又有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识储备,能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融会贯通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要的通才”。^[37]原来那种带有“拿来主义”“实用主义”色彩的“结合”显然已经难以满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原创性、突破性发展的需要,难以满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发展的需要,难以满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需要,而只有有机结合才能形成有潜力的超越和突破。有机结合需要把握本质、本原、本真,进而“返本开新”。这也就是为什么党的十八大

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38]深化了邓小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创期关于“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说法。

推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成就、有机结合,既要重视结合的过程,也要重视结合的结果。因此,还需要厘清“第二个结合”究竟“结合成什么”的问题。既然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是一方“吃掉”另一方,也不是机械式的捆绑,那么作为一种有机合理应产生出一种新质事物。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结果就是“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39]具体来说有三个方面:一是,经由“结合”,让以西方“外来者”身份进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融入中华文化母体,褪去其“外来者”身份,真正实现“本土化”,成为中国的;二是,经由“结合”,让马克思主义的普照之光洗礼“受到当时人们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的传统文化并且“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40]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三是,经由“结合”,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进而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一个历史性的课题、长期性的过程,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都是“结合”的阶段性产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传统文化现代化都是其“题中应有之义”,但最根本的是通过“结合”催生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

(二) 汇聚主体合力,实现有力结合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是一个无主体的自然性过程,而是需要一定主体的积极推动。因此,有力推进“第二个结合”,需要明确结合的动力、主体,也即“动力何在”“谁来推进”等问题。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一篇大文章,需要解决好动力问题。那么,“力”从哪里来?总的来讲是两个方面的:一个是外部推力,一个是内部动力。外部推力主要来源于西方世界的“冲击”,国内外历史教训的“警示”,以及自身发展现实问题的“倒逼”。内部动力概括来讲就是,坚持并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各主体之间形成的“合力”。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有政治、学术、大众三种基本形态,推进“第二个结合”对应的也有政治主体、学术主体和大众主体。“广大党员干部、哲学社会工作者和人民群众是推进‘第二个结合’三个不同层面的主体力量,在推进‘第二个结合’的过程中都发挥着各自的重要作用。”^[41]“三大主体”之间的合力决定了坚持和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力度。

那么,政治主体、学术主体和大众主体在坚持和推进“第二个结合”中各自发挥什么样的主体功能,不同主体力量如何形成合力呢?

一是,坚持和推进“第二个结合”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任务,离不开政治主体的组织和动员。马克思主义是立党立国、兴党兴国、强党强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割不断的“根脉”与“基因”。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总结百年党史提出的重大政治命题和政治任务,坚持“第二个结合”事关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事关中华文化传承发展。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各级政府是当代中国最具权威、拥有优势政治资源的团体型政治主体,身处要职的领导干部是重要的个体型政治主体。政党、政府和领导干部在政策制定和国家治理中要把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与礼敬传统相结合,发挥好组织动员、资源整合、导向激励职能,系统谋划和推动“第二个结合”走向实处。

二是,坚持和推进“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需要学术主体的阐释和引领。这里的学术

主体,主要指从事与马克思主义、中国文化相关研究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机构和学者。理论是实践的先导,理论上清醒政治上才能坚定,实践时才会有力量。恩格斯讲:“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42]学术研究是学术机构和学者运用理论思维对研究对象进行系统化、专业性的反思、批判和审视,能够突破常识经验的狭隘性。离开学术性的观察和思考,现实只是经验性的现实,不是经过理性反思和审视的现实。当然,学术不能脱离政治实践和大众生活,否则就是抽象、空洞的概念思辨,就会显得苍白无力。推进“第二个结合”,学术主体要发挥好“报晓鸡”和“啄木鸟”的作用,以理论的方式研究现实并为政治和大众提供前瞻性的、可预见性的思想指引,要深刻总结“结合”的历史经验、教训,深度阐释“结合”的必要性、前提和结果,前瞻性思考“结合”的原则、路径和方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43]学术主体要着力提高学术含量、学术水准、学术影响,积极参与公共事务讨论和政策制定,为大众立言立论,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建言献策,引领“第二个结合”走向纵深。

三是,坚持和推进“第二个结合”是大众化与化大众的事业,依赖大众主体的参与和实践。当前,关于“第二个结合”相关问题的探讨主要集中在政治和学术领域,日常生活中的大众对此的关注和思考实际上并不多。“第二个结合”需要落实在政策、文件中,体现在学术成果中,但如果只停留在政治或学术范围内,没有大众的响应、参与和力行,这样的“结合”没有生命力,不是真正的结合。坚持并推进“第二个结合”,归根结底要活化在社会大众的生活之中,这样的“结合”才是现实的。“仲尼有言:礼失而求诸野。”(《汉书·艺文志》)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世界是“第二个结合”最鲜活、最深厚、最丰富的实践场域。大众主体需要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增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认同,发挥首创精神,通过大众的参与和实践推动“第二个结合”走向大众生活。

总而言之,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力结合,一方面需要党政的组织和引导,政策措施要有牵引力;一方面需要学术理论上的研究和阐释,研究成果要有感染力和影响力;一方面需要大众的自觉践行,实践要有创造力。各主体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仅要用心用情,更要用力,不仅要有声有色,更要有为、有样。政治、学术和大众三大主体三力汇合形成合力,确保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有力推进。当然,坚持和推进“第二个结合”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既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与历史耐心,更要有“功成必定有我”的责任担当与历史自信。

(三) 找准结合点位,实现有效结合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旗帜,是当代中国的指导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根”,两者相结合的成效事关党、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因此,两者的结合不是经院式的“太空”,也并非经验式的“就事论事”,而是“顶天立地”、切实有效的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结合,需要找准结合的点位。这有三个方面要重视。

一是,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华文化世界化发展的历史方位,使两者的结合同向同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结合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既要正视时代发展的实际,也要立足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不能时空错位,否则必定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任何一种具体实际,都是一定历史时间中的实际,也是特定空间中的实际。”^[44]因此,坚持和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要理解和把握彼此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这里的“历史方位”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方位和中华文化时代化发展的历史方位。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的西欧

创立,20世纪在俄国和中国得到发展,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历史性地转移到当代中国,“当代中国已成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生长点、发展源与大本营,成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实践创新地和理论策源地”。^[45]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就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历史方位。中华文化发展的历史方位是什么呢?就是中华文化在历史上曾经长期辉煌,近代“蒙尘”并面临严峻的存续性危机,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介入,逐步实现由被动到主动、自卑到自信、传统到现代、凋敝到繁荣的历史性转折。中华文化时代化发展的这一转折,不仅要助力解决中国自身的问题,而且要走向世界,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这一历史方位是从“世界失我”到“世界有我”,再到新时代的“世界向我”的转变,可以概括为“中华文化世界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历史方位,中华文化时代化、世界化的新历史方位,是总体性、根本意义上的“中国具体实际”。把握彼此所处的历史方位,在同向同行中实现“营养互济”,这是坚持和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有效结合的前提。

二是,聚焦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使两者的结合有的放矢。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问题,为了实现心中的理想和目标。马克思指出:“问题却是公开的、无所顾忌的、支配一切个人的时代之声。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46]破解时代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出场的基本路径,解决中国现实问题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动力。马克思主义揭示了“资本奴役劳动并控制社会”的“时代境遇”,科学回答了人类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仍然是我们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的强大思想武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之“根”,不仅标识着“我是谁”“从哪里来”,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华民族“向何处去”。特别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开始“领起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和文化智慧日益展现出回答时代之问、世界之问的独特价值和意义。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文明处在新的十字路口,坚持和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必须聚焦时代和实践提出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把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作为聚焦点,以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等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服务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于现代化强国建设,服务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得是否有效,关键就看有没有切实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发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引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建设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原创性智慧和方案。

三是,坚持守正基础上的创新,使两者的结合同频共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在新时代明确提出的,但是,这并非新近才产生的问题,而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百余年的历史之中,贯穿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文化现代转型变迁史中。“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47]历史中形成的规律性认识、正确的经验与原则需要继承和坚守。而对原则性的继承和坚守不能故步自封,更不能“削足适履”,必须结合新的情况进行创新发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还有许多未知领域。但是,走得再远,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本质原则不能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能割裂。在守正中创新,是确保有效结合的一个基本原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48]中国近代以来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史表明,不是传统文化救了中国,而是马克思主义指引中国革命胜利进而挽救了中华文化的危机;不是传统文化把一个满目疮痍、贫穷落后的中国推向世

界,而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富强了中国进而将中国传统文化推向世界。传统文化是在中国传统社会产生的,不仅有鲜明的民族性,而且也确有其历史性(突破性与局限性)。要警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过程中消极因素的渗入,真正使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相贯通。

注释:

- [1]《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9页。
- [2]习近平:《中国共产党90年来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的与时俱进及历史启示——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党建研讨会上的讲话》,《党建研究》2011年第7期。
-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页。
- [4][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91、562页。
-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艺论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48页。
- [7][8]《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11页。
-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十五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51页。
-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二十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18-319页。
- [11][1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35、212页。
- [13]《江泽民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78页。
- [14]《胡锦涛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438页。
- [15][27][35][39]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
- [16][26][2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605、500页。
- [1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66页。
- [18][31][40]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82、83、57页。
- [19]参见方兰欣、郑永扣:《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与意义》,《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5期。
- [20]韩庆祥:《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层逻辑和基本原理》,《阅江学刊》2024年第1期。
- [21][36][48]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1、18、20页。
- [22]郑永扣、方兰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中华文化》,《河南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
- [23]陈培永:《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相结合”的深层意蕴》,《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2021年第3期。
- [24]张岱年:《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86页。
- [25]习近平:《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求是》2020年第1期。
- [29]孙正聿:《马克思与我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27页。
- [30][32]《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72、73页。
- [33]韩美群、宋州:《文化建设的中国话语》,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77页。
- [34]戴木才:《“以马代儒论”和“以马废儒论”批判》,《长安大学学报》2022年第2期。
- [37]高长武:《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四题》,《红旗文稿》2018年第5期。
- [38]习近平:《推动全党学习和掌握历史唯物主义 更好认识规律更加能动地推进工作》,《人民日报》2013年12月5日。
- [41]杨志超:《新时代推进“第二个结合”的价值意蕴、原则要求和现实路径》,《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
- [4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7页。
- [43]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 [44]韩庆祥:《全面深入理解“两个结合”的核心要义和思想精髓》,《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10期。
- [45]韩庆祥:《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性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4期。
- [4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03页。
- [47]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7月2日。